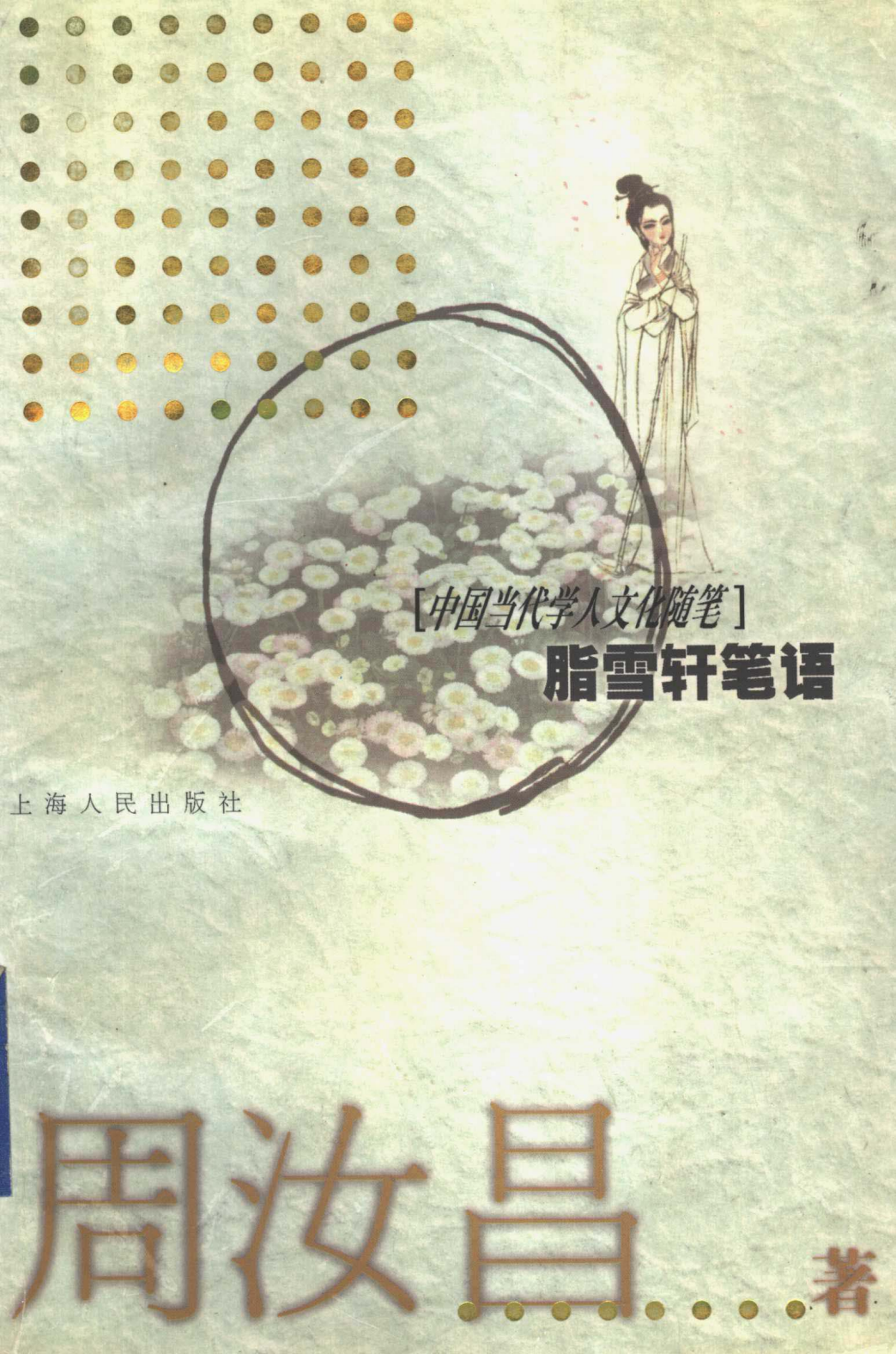




[中国当代学人文化随笔]

脂雪轩笔语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周汝昌

著

[中国当代学人文化随笔]

脂雪轩笔语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脂雪轩笔语 / 周汝昌著; 周伦玲编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出版社, 1999

(中国现当代学人文化随笔 / 邓九平主编)

ISBN 7-208-03245-9

I. 脂... II. ①周... ②周... III. 社会科学-随笔-文集 IV. C53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45728 号

责任编辑 任余红

封面装帧 王建国

· 中国当代学人文化随笔 ·

[主编 邓九平]

脂雪轩笔语

周汝昌著 周伦玲编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 邮政编码 200020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中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2 插页 2 字数 226,000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5,000

ISBN 7-208-03245-9/G·611

定价 22.00 元

自序

《脂雪轩笔语》的题名，何所取义？君能知否？

你有灵心，一见便早心领神会：“脂雪”者，脂砚与雪芹的合称是也。以此名轩，是一个“红迷”的书房也。此外奥妙还有几多？

你有悟性，但还不够，只悟出了三分之一。

除了“脂”“雪”合称一层，另一层是取于东坡的《寒食》诗，他写海棠正开，夜为风雨所欺，纷纷飘落而成为“泥土胭脂雪”。此五字，悲深艳极，写尽了东坡这位高人的情怀心绪，是千古绝唱。

还有什么取义呢？

这个典故出于康熙时刘廷玑的《在园杂志》，他记下清初风尚，最珍的皮毛是猢猻，轻暖而又美观。猢猻皮毛中最好的是白毛中泛出粉红斑点的那种，浑如雪中透出胭脂，故名为“胭脂雪”。

我爱《红楼》，也最爱海棠，也深喜猢猻衣裘。定以轩名脂雪——君未尽明也（正如拙号“解味道人”，人亦不知

含有三层取义。今不枝蔓)。

那么“笔语”又何谓耶？

这得请胡适先生作解。我们中华自古是口说为语，笔写为文；自他力主“白话文”，本身即陷于矛盾不通了，从此中国人不再能够写文，只会写话。既然如此，我只好叫它做“笔语”了——先前无人怪胡先生，现今又何必怪我这个名目乎？

我们中华学术著述，讲究三美具备：考证、义理、文采。三者备为上乘。其实撰文何尝不是如此？历来脍炙人口、传诵不衰的好文章都是有审辨（考证），有思想（义理），有“可读性”与文学审美享受（文采）的。三者缺一，实不成“文”。称“文”，谈何容易！

所以不敢题什么“文集”、“文存”、“文钞”之类好听的名目。

自古佳文皆琅琅上口，人人背诵；自胡先生“白话文”出来之后，可有谁背得出哪一篇“白话文”来？事理可思矣。

这本书，所收就只够个“笔语”的品位，难以攀“文”。若再求考证、义理，那就更不行了。

考证，久被贬斥，人都“敬畏”而远之了。义理呢，我更惭愧，因为没“道”可载。

虽说如此，竟还有读者——今天应多谈“有市场”吧？这真叫各有所好，口味不同。

友辈说：你的文有特点，掩住署名，看了几句就能猜出是你写的。

这评价太高了。我若真能这么样用“笔”，就自豪起来了——只怕未必，耳濡目染，不知不觉就随了“大溜儿”，轻言特点，近乎夸大其词；假若真有某些与人不尽相同之处，也许就是不写“洋八股”，即“翻译文字”的语式腔调，现时铺天盖地已然多是“洋式中文”了，哪儿还有什么中国语文特色？

中国名著本叫《西厢记》，但这不行，得改成《一位少女的热恋》。文章的设题已不再是《彷徨》、《呐喊》，而变成《灵魂的探险》、《生命的燃烧》了，又遑论什么《岳阳楼记》、《滕王阁序》、《赤壁赋》……哉。

历年积存了这么些这么样子的“文章”，也编过小集子问世。这一册是重编的，搜集了一些久佚复现与新写未发的；也有少数几篇是见于已编之内的，这是为了就内容分类而作的“搭配”，用意是使读者在一本书内能看到较多的方面。

胭脂如雪，轩窗不掩，几片飞红，落于笔砚之间。我笔无文、乏采，借以为点染之意吧。吴文英《梦窗词》中的一首《江南春》，起拍三句云：“风动牙籤，云寒古砚，芳铭犹在棠笏。”这不正是脂砚又名畸笏的来历吗？笏者，古以状砚之长方形也。

周汝昌记于脂雪轩中

自序·····	[1]
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前后左右 ·····	[1]
倡导校印新本《红楼梦》纪实 ·····	[8]
现身“说法”·····	[17]
雪芹赋赞·····	[21]
楝亭四像一无踪·····	[23]
石涛与曹寅·····	[26]
艺坛三秀绘红楼·····	[30]
查家与曹家·····	[32]
胭脂米传奇·····	[34]
承泽园轶事·····	[37]
雪芹祖上范家屯·····	[40]
南京应建曹雪芹纪念馆·····	[44]
议政谈红·····	[47]
过场人物乎？结局人物乎？ ·····	[51]
雪芹印章·印缘小札·····	[55]
触类旁通·····	[58]
应识灵山·····	[62]
“情教”创者曹雪芹·····	[65]
冒烟含露见颦颥·····	[68]
——黛玉的眉和眼难倒了雪芹	

椽笔谁能写雪芹·····	[71]
《红楼梦》食谱闲话·····	[79]
《红楼梦》中的女性美·····	[83]
齐白石和曹雪芹故居·····	[87]
我与胡适先生·····	[90]
燕园名师顾随先生·····	[103]
怀念杨霁云先生·····	[115]
张伯驹和潘素·····	[119]
沽水年华·····	[124]
宋代三女砦的遗址·····	[134]
直沽的喜讯·····	[137]
黄叶村·····	[140]
津门杨柳系芹踪·····	[143]
天妃宫始建何年及其他·····	[146]
再论天妃宫始建·····	[149]
曹雪芹到过天津吗? ·····	[153]
试解艳雪楼·····	[156]
豆子航传奇·····	[160]
天津怪话·····	[164]
津话再谈·····	[166]
“吴歌”和“转卫”·····	[169]
嘉节号长春·····	[172]
盐祖和雁户·····	[175]

果师卢长顺	[179]
《燕京乡土记》序言	[182]
恭王府传奇	[186]
太平湖梦华录	[190]
东皋·方观承·程砚秋	[197]
关于“北京钟楼的钟声”	[200]
莲池北岸的天香楼	[204]
胡同·衙通·弄堂·火巷	[206]
救救胡同	[210]
 白话与文言	[213]
风格即审美	[218]
中国史前维纳斯	[221]
石性通灵	[226]
“公元”及其他	[229]
我心目中的戏	[233]
白头人唱红楼梦	[236]
——记弹词专家黄异庵	
一人演说众生相	[239]
我看评弹	[242]
“纪实小说”与“原型官司”	[245]
不妨拍摄一部“大禹治水”的动画片	[250]
书法宜辨“二自”	[254]
学书杂语	[256]
评介《中国历代赋选》	[264]

北大的大象大器	[269]
黄府巍巍百岁尊	[275]
荣与愧	
——获《北京大学学报》奖之感言	[281]
巍巍上庠	[284]
美红散记	[287]
海外的“忘机”	[308]
客居滕语	[311]
美国“鬼节”一瞥	[317]
我读中学的时候	[321]
奖牌	[324]
红楼升官图	[327]
蛇尾马头	[332]
开岁相逢说吉羊	[335]
喜迎亥猪	[340]
葦与音乐	[344]
奇景	[348]
体验生活	[351]
我的愚见	[355]
从日本人讲礼想起	[358]

目 录

鸟·倒字·水浒注·····	[361]
秋之说·····	[364]
曹雪芹·妇联·十七名·····	[367]
印话·····	[370]
漫话读书·····	[372]

《红楼梦新证》的前后左右

1982年新本《红楼梦》的来由,《倡导校印新本〈红楼梦〉纪实》一文粗有叙纪。那主要是想说明:从1947年起,与家兄祐昌立下誓愿,一为努力恢复雪芹真本,二为考清雪芹家世生平的真相,以破除坊间流行的伪本与学界不甚精确的考证结论。

上次只叙了一个问题,如今再追述以前的一段经历——复杂,曲折,鲜为人知。

《红楼梦新证》本体完成于1948年。《燕京学报》第50期登出拙文《石头记三真本之脂砚斋评》,文末提到撰写那部书稿的事——初名《证石头记》。

此文出后,引起不少人注意,包括朱南铣、文怀沙、张慧剑、黄裳……诸位(以下行文为避繁赘而省篇幅,俱不具称某某先生。但绝无失礼欠恭之意)。张氏在沪上《新民报》发文赞赏,朱氏洽借《甲戌(录副)本》,……而黄裳(南开中学同窗挚友)则主动写信,推荐此书稿交开明书店出版。黄裳信函是写给叶圣陶的,我遂将此信并书稿

寄与叶老。久之，原件退回（内中连一纸退稿便笺亦无）。而此际文氏亦已注意到《证石头记》，他拜访孙楷第教授（因拙文中提到他），询问我在何处，要谋一面。孙老设晚餐，派夫人来邀我去一会——但孙太太只言“文化部来人要见你，孙先生请吃晚饭……”而那天恰值我在忙着收拾衣物，满室凌乱不堪，火车票都已订好，急于赶车回津（已放寒假），心绪如麻，实难应命赴宴款谈，只好悬辞。孙太太连来两次，终于无法解决。此事定会让孙老很不体谅。

及假满回校，清华大学友人周祖谟来晤时，忽谈及他与文怀沙因某场合见面，也提起我“拒不接见”的事，说这个人如此“狂傲”，架子何其大也！周即答言，与我交久，深知其人最为儒雅谦和，断无此理——当时必有缘故……我到此方知文先生欲晤的本意在于为《证石头记》出版的要事——而孙太太恳邀时并无一言及此也。

由此我这才与文怀沙取得联系，约好将书稿交他。家兄枯昌比我还重视，在极困难的条件下，将近40万言的巨帙一手楷字清缮出来，交付完妥。

1951年秋，我受成都华西大学电聘，去做外文系讲师（因闻在宥教授于 *Studia Serica* 学报上见到我一篇研究陆机《文赋》的英文论文。其时我尚在燕京大学中文系研究院），于次年5月1日到达华大。当年秋高校大调整，我调入四川大学，冬季开始分批接到书稿的校样（沪排，寄北京文怀沙转我，我校毕寄还文处。如此往复多次方全部校完）。到1953年9月5日，我收到了样书。书是棠棣出版社所印，由长风书店发行。文怀沙不喜《证石头

记》这个名字,建议改成了《红楼梦新证》——是针对胡适的《考证》而取义的。他还请沈尹默题了封签,蒋兆和夫人萧重华绘了旗装清代少女的图像。见者皆感到耳目一新。

此书问世后,其反响可谓名副其实的盛极一时——但也很快招来了莫大的“后果”。

“盛况”一言难尽。今只举几项罕逢的现象,或亦可为出版史、学术史上的一页轶闻掌故。

先说上海,长风书店门前排队了,书脱销,三个月内赶出三版。大学者张元济(菊生)、顾廷龙等皆在阅读——此闻在有到沪后特函相告。不久张菊老令儿媳代笔来函询问一二问题,随后又亲笔复我去函(他病瘫已久,原不能书写,因高兴破例亲书,然手颤,书字几不能辨识)。

在京、津,高校老同窗来信,说“文代会”上几乎“人手一编”,某单位已要调你……

在成都,川大图书馆馆长告诉我:“馆里一次买了十部!”(说时以手指比划为十叉状,因蜀音“四”“十”难分)。校中师生多人在购读,一位不熟识的外文系教师忽打招呼:“老周,你害苦了我了!”闻之愕然,忙问何事相累。他说:“我日来患了重感冒,正在难捱,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,我这一开读不打紧,整整一夜放不下了——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!这两日才刚好些……”诸如此等,佳话趣谈真多。

在海外,很快盗版了。美国赵冈教授首次晤面即言:

“您可知大著在美国卖多少美元？连看旧了的一部，也要惊人的高价呢……”

在英国，有一部著作，引及《新证》多处（据云 70 余处）并注云：篇幅如此“重”（heavy）的学术论著，三月连出三版，印数高达 17000，实印刷史上罕见之例。

如此叙来，不必再举，已足证明我在彼时已成了“红人”——谁想，这部书也招来了嫉嫌，以至把我卷入了一种“险境”之中——此险境真可谓多方受敌、四面楚歌，而当时我这三十三岁的“大孩子”尚在“春风得意”之中，一点儿也无法想象前景是一片风波之航与荆榛之旅——

先是友人传来“内讯”：社科院文研所已准备调我。其后受阻而告“内消”。再后则原燕京大学林庚老教授忽然惠函，具言人民文学出版社聂绀弩（古典部负责人）有意邀请，特烦函商。我虽也喜欢成都，到底更愿回京，于是答应了。该社总社长是冯雪峰，副领导巴人（王任叔）主管“古典”之事（另有楼适夷则主管鲁迅、翻译等编室）。故调我是由当时中宣部特电川大，而川大不放行，传出风声：“外文系即使不办了（当时学生不愿学英语了），中文系也请留。并且即可晋升副教授……”

后闻特调电已至再至三，川大校长彭迪先方说：“再不放他，就是不服从中央命令了！”并召见我，嘱我回京后仍然关心川大的事业。

我于 1954 年春末，穿三峡而北返，放弃了高校的副教授，当了一名可怜的编辑。

入社之后，聂绀老交付的第一件工作是“恢复”已出

之《三国演义》中的题咏诗(聂云:毛主席见该社校印的《三国》尽删其中“后人有诗叹曰”等大量诗句,说这不行,要恢复!对此我另有专文叙及了,今不重复)。此事完成,即命组成一个专组,专门整校一部新版佳本《红楼梦》。因这件工作甚合我的平生大愿,故很高兴,即订出计划交上去了,聂老等也点了头,立待执行。

当时我被安排在一楼,与舒芜同室办公。一日,舒芜忽从二楼聂处(聂独一屋,生活与办公皆在其间,不另坐班)回室,推门进来,向我传达指示:领导有话,新版《红楼》仍用“程乙本”,一字不许改——实在必须变动的(如显误、难通等原有的讹误字)也要有校勘记,交代清楚。

舒芜话很简洁,面无表情,此外无一字闲言。我虽书生气十足,却也意识到事情大不简单;而且,聂公对此,从头到尾,绝无片言向我直接传示与解释(这与他给我的任务恰恰相反)。我初到不久之人,一切不明真相,与聂老交又不深,故此总未敢向他请问一句——这都是怎么回事?!

此事于我,至今还是一个大谜。我只好服从命令,做我最不愿做的“校程乙”工作。

很久以后,渐渐得闻,原来“人文社”调我也有原因:该社所出的头版《红楼梦》,是采了亚东图书馆的(胡适考证、陈独秀序)程乙本,本已是一个不甚好的“杂校本”,又经当时负责的编辑汪静之“整”了一番,不知怎么弄的,反正是问题不少;俞平伯看了,很有意见,就向胡乔木提出批评。胡据俞说,又批了“人文社”。这下子,社之有关领

导、负责人等吃不住了，据云在内部和公开的会上，作了检讨。这样，当然心里窝着气，又无善策——才想要调我来“重整旗鼓”。未料此策失灵，也不知怎么反复决策：硬命令坚持那个“程乙本”。

再说说我这“红人”的事——

大约我刚返京华，《文学遗产》创刊版在报上问世了，其第一篇是俞平伯红学专家的大文，即对《新证》提出批评，记得其要点之一是说曹雪芹还是“汉军”，而拙考谓为“内务府包衣人”，皇家奴籍是“周君标奇立异”，是“错”的，云云^①。随后，又有署名“粟丰”的批评文章，大意是说我的观点不正确，对“写实”的概念有不同见解（鲁迅早就提出的“正因写实，转成新鲜”一义，加上雪芹原文“实录其事”等等，我很强调芹书与西方虚构小说不同，而这是它“自传性”的基本因素，似乎粟文意在必须“集中概括”“典型化”才对）。

以后，《文学遗产》及其《增刊》还有其他鸿文续予批贬。我这部“走红”为时甚暂的“大著”由此逐步褪色——走向了“灰黑”^②。

我刚回京，首次见聂老，他就对我说：《新证》出后，毛主席看了……此事我不敢深问，但相信这不会是讹传。如今证实，见徐中远著《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》有两处提到《新证》（华文出版社 1997.1），我之所知，限于此一句传闻。这对我此后的“命运”如何？也不深知，无从探究。但当年下半年，批俞批胡运动就逐步展开而升级了，我很快变成了“资产阶级胡适派唯心主义”的“繁琐考